

ZXFK 红色记忆

张震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征程中，有太多为党的事业忘我奋斗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共产党员。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曾为工作太投入而将粽子蘸墨汁吃而不自觉，在党内留下了“真理的味道够甜”的佳话。从涪陵走出的四川早期工运先驱钟善辅在革命生涯中也曾有吃墨的小插曲，那是在成都市工会成立前后，钟善辅和同志们一起赶印文件，饥肠辘辘之时一个同志买回几个锅盔充饥，大家顾不上洗手边吃边干，钟善辅戏谑地将锅盔称为面包，将油墨称为果酱，自嘲能吃上“面包(锅盔)”夹“果酱(油墨)”真不错。他所吃的墨与陈望道所吃墨虽在“味道”“品质”方面有差别，但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忘我工作的内核却是一样的。

钟善辅，1899年出生于四川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罗云乡，1917年到成都警监专门学校求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成都受到各种新文化新思想洗礼，在此求学的钟善辅接受进步思想影响，立志投身革命。1920年底王佑木在成都成立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次年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支部，钟善辅加入读书会并成为团支部成员。1922年，成都团地委成立，钟善辅被选为候补执委，此后在团组织的几次改选中当选为执委。1923年成都秘密建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他由团员转为党员，成为四川首批共产党员之一，也是涪陵党史上第一位中共党员。他是四川工运的杰出领导者，“面包(锅盔)”夹“果酱(油墨)”只是他忘我开展工运斗争的一个小插曲。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就不辞劳苦将一生贡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将工人运

ZXFK 史海拾贝

颜坤琰

1933年8月，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曹禺完成了《雷雨》剧本的初稿。这年他23岁。他将《雷雨》手稿交给了正在筹办《文学季刊》的老同学靳以。靳以是曹禺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他们曾义结金兰。靳以深知曹禺的才华，见曹禺写出一部大型话剧，自然十分高兴。他兴致勃勃地将《雷雨》推荐给第一主编郑振铎，不料郑振铎过目后“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但是，靳以并不甘心挚友的一番辛苦付诸东流，不久他又将剧本交给《文学季刊》负责审阅剧本的编委李健吾，孰料，这位戏剧名家看过《雷雨》原稿后也不认可，“不肯推荐这个剧本”发表。这让靳以十分尴尬，他只好把剧本暂且放在了抽屉里。

1933年9月，巴金从上海到北平看望沈从文，在沈家住了一段时间后，迁住《文学季刊》编辑部所在地北海前门三门大街14号。这个编辑部平时只有靳以一人。巴金在这里前

ZXFK 史海钩沉

周云

南宋重庆知府招贤

南宋淳佑二年(1242年)，南宋王朝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余玠的帅府旁边修建了一个招贤馆。该招贤馆与余玠帅府陈设完全一样，专等贤才来投奔。

这个招贤馆，是余玠专门设置的。当时，北方蒙古军对四川虎视眈眈，为寻求治蜀抗蒙之策，余玠决定效仿三国时期诸葛亮明治理蜀地的办法，集众思，广忠益，向社会招揽贤才。他在招贤告示中说，有策谋想告诉他人，家住近处的就径直来帅府旁边的招贤馆，家住远处的可自行到所在的郡府去谈，官府要以礼相待，高爵重赏，朝廷也会不吝酬报。

余玠设馆招贤的消息，很快传遍川蜀地区。当时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也属四川管辖。家住播州绥阳县山区的冉璉、冉璞兄弟决定出山，会一会这个设馆招贤的“余帅”，看他真是真招贤还是假招贤。

冉璉、冉璞兄弟到了重庆，向余玠设立的招贤馆递上各自的“名片”。余玠久闻冉氏兄弟雄才大名，决定将兄弟俩请进帅府会见，施以平等礼节，并为其安排高档住处。对此，冉氏兄弟居然毫无惊喜，以平常心心态接受。

过了数月，冉氏兄弟心安理得住在客栈，一字不提任何建议。余玠决定向他俩伺候请教，并亲自主持宴会，邀请冉氏兄弟及其他前来投奔者赴宴。

酒喝到畅快之时，在座来客纷纷“晾晒”自己的高明策谋，而冉氏兄弟却只顾饮酒用餐，依旧一言不发。余玠有意以含蓄的话语引导他俩，他俩仍只顾饮酒用餐，默默无言。对此，余玠并不责怪。他暗暗琢磨，冉氏兄弟不轻易说话，不过是在看他怎样礼待有识之士罢了。

第二天，余玠让冉氏兄弟换住另一处更

甘将热血沃巴蜀

——从涪陵走出的四川工运先驱钟善辅

动作为中心工作。成都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工人运动中，钟善辅作为骨干成员，义无反顾挑起了发动组织成都工人运动的重担。针对当时成都工人阶级缺乏工会组织统一领导、文化水平低、封建思想影响较深等特点，他通过组建行业工会、办工人夜校，亲自授课教工人读书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等形式，从组织、文化、思想等方面启发引导工人。经过钟善辅和其他团员的努力，成都地区工人文化水平、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建立了长机、生绉等二十余个行业工会组织，为成都工人运动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成都团地委组织工人发动政治罢工声援，下旬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了有四千余群众参加的集会。在集会上，钟善辅冲破阻挠，率先登台发表演说，控诉谴责反动军阀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战。现场群众深受鼓舞，觉悟进一步提高。声援活动后不久，成都二十多个行业工会实行大联合，于当年5月1日组建成都劳工联合会，钟善辅被选为副会长，从此成为成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劳工联合会成立以后，钟善辅等人于1923年秋至1924年春，组织领导了生绉、长机工人增资的罢工，又和孟本斋一起领导了长机工人反“朱尺”的罢工斗争，均取得了胜利。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钟善辅等人发起成立“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在成都国民外交后援会带领下，各界群众与反动派开展斗争长达半年之久。1925年底至1926年春，钟善辅又成功领导了人力车夫取消押金和减低车

租的大罢工。

在钟善辅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成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推动了四川建党和成都市总工会的成立。1925年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领导全川党组织，成都工运也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进行。1926年春，钟善辅担任中共四川西特委工运委员，负责领导全川工人运动。1926年10月，成都市工会成立，钟善辅作为会议主席报告了工会筹备经过和各分工会成立情形，被推选为工会副会长。成都市工会成立以后，钟善辅等人除对原有工会进行整顿巩固和加强思想教育以外，还发展了一些工会组织，持续深入推动四川工人运动的发展。成都市工会在全国总工会指导和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所属基层工会组织由几个发展到了64个，团结工人群众万余人。

由于在工人运动中的卓越成效，1927年2月，钟善辅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川职工运动指导专员，并被赞颂“为工人阶级奋斗，对于四川工运运动的情形尤能深切了解”。

正当四川以及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方兴未艾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大批共产党人遭屠戮。在成都，蒋介石亲信、四川整理党务特派员向育仁叫嚣着“清党反共”“打倒钟善辅、活捉孟本斋”，砸毁了成都市总工会。面对白色恐怖，钟善辅以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在常年伴随他的印泥盒底部刻上了“生为坚强壮，死为精忠魂”十个大字，表明和反动派战斗到底的决心。他长期为工人群众奔走，得到了工人们衷心拥护和爱戴，当此危难之际，工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日夜保护他，才使他逃过一劫。

巴金慧眼识曹禺

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而且为它掉了泪。”

第二天，巴金将剧本推荐给郑振铎，并且作主将这个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1日出版)上一次性刊登完毕。

《雷雨》刊出后，引起了极大反响。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武田泰淳把《雷雨》带到日本。1935年4月，中国留日学生戏剧团排练了《雷雨》，4月27日、28日、29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引起轰动。1935年，《雷雨》剧本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并迅即出版。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1936年5月上旬的一天，他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出的有关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提问时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

ZXFK 寻踪

庞国翔

探访“香炉石”



红岩露红巴南三地交界处的香炉石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驻足在香炉石下，一阵山风吹来，炉石似摇摇欲坠，令人惊心动魄，很快又有美妙动听的敲罄之声回旋在耳际。倚在香炉石旁，放眼太公山下，那更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图画；起伏的山峦、如练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村庄、袅袅的炊烟尽收眼底，杜市场、副都市场、太平场、高歇场、青江场，都遥遥可望。

杜市场的党委书记江波告诉我们，现在的太公山已打造成了瓜果花木之乡。每年三四月，满山的桃花、梨花、梨花盛开；五月七月十月，又是枇杷、葡萄、柑橘成熟时节……这饱经沧桑的香炉石，见证着太公山的变化和发展。

1916年卢作孚23岁时，写了《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一文，振聋发聩地提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并表述了以下观点：“吾将更进一步论教育经费之宜谋充裕；教育权限之宜谋扩张；教育人才之宜谋独立。要即欲教育有完全独立之精神，不受外界之逼拶，及为他潮流所牵引，以尽教育之能事，得在亚洲大陆放一异彩，致富国强，毋落人后。”

1922年卢作孚29岁时，应杨森邀请，到泸县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任科长。他创办了《教育月刊》，并在《发刊词》中再次呼吁：“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他邀请少年中国学会友人恽代英、王德熙等，在川南一带掀起轰轰烈烈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运动，其影响所及，遍布全川。卢作孚也因此被现今的教育学者誉为“二十世纪初地方教育实验的一个典型”。

卢作孚一生中创办过小学、中学、大学，还把民生公司及各厂实验学校成立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例如，民生公司的员工培训就相当丰富：小到各种专项培训，包括轮机、茶房、餐伙、家属技能等；大到思想境界、精神文化的育成，还邀请了不少名人，如张澜、黄炎培、杜重远、冯玉祥、马寅初、梁漱溟、陈独秀、沈雁冰(茅盾)等到公司演讲，让员工从技能到精神都融入了新的现代文明。社会上的人都称道：“民生人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峡防局的大力帮助下，复旦大学、江苏医学院、国立戏剧学校、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著名大专院校迁到北碚。抗战结束后，这些学校都陆续回到原地，而学校的川籍学生却无法前往，面临失学的困境。卢作孚就与一众社会贤达商量并募集基金，由其担任筹备主任，在复旦大学原址创办一所私立大学，以满足这些川籍学生继续深造的需要。学校取名相辉学院，以纪念复旦大学两位校长马相伯和李登辉。1946年8月10日卢作孚在筹得资金后，给教育部递交了申请报告。

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当年10月5日学校开学，圆了卢作孚在辖区创办大学的梦。著名水稻杂交专家袁隆平先生1949年考进相辉学院农艺系深造。该学院后并入西南农学院，即今天的西南大学。

卢作孚这一系列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最终都落脚到“以人为本”和“人的现代化”上。他认为：“教育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是要欣赏建设与社会进步的教育普及。除教育普及外，还得更要科学和艺术的研究，继续不断地提高其程度，使能应用世界上已有的发现、发明和创作，而更进步。”在这里，每一个人既是受教育者，也是建设者，同时还是欣赏者，要懂得“欣赏建设与社会进步”。

(作者系卢作孚长孙女)

潘光旦说士

沈治鹏

潘光旦认为教育就是要教人学会做人，做“士”，对聪明智慧的人，尤其要教会其做“士”，凡是专家学者都应该学会做“士”。他说：“士”的教育着重于于情绪和意志的培养。”也就是人们当下所说的情感世界和意志的培养。人的情感和意志，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培养出来的，从对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克制中培养出来的。

潘光旦认为“士”是传统文化中最值得继承的遗产，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是百世不朽的人格典范，有着顶天立地的浩然之气。所以，他十分看重古代先哲对“士”的解释及其现代意义。“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士”为人处世最后也是最有力的道德防线，是“士”应有的凛然正气和壮烈情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要有远大的抱负，要立志高远，不要看重眼前的利益，不为浮云遮望眼，不要被眼前利益束缚。“士”应该有广阔的胸怀，不能肠小肚、斤斤计较。“士”应该有坚毅精神，不要脆弱胆怯，“士”只有弘毅之至，才敢希望于必要时时走成仁取义的一步”。

潘光旦说，“士”的教育，第一是立志，志士心之所至，或心之所止，即一个人的生命总得有个比较清楚的目的，也就是要订定一个健全的立身处世的主意。第二要学志恕一贯之道，所谓志恕就是笃信，就是轻易不肯放弃立场，不随波逐流，不赶时髦，不随便改变自己的初心，要坚定不移而不舍。所谓志就是容忍，就是宽容，就是谅解别人，就是海纳百川，就是不计前嫌。

同时他还说，“士”的教育是受年龄限制的，它有别于识字教育、职业教育等，这些可以在任何阶段内学习起来，惟有“士”的教育不行，非在青年时期内学习不可，这与人的初心有关。因为青年时期人的思想意识纯净，没有受到污染，大都是纯洁正直的，便于培养。青年时期由于没有什么桎梏，价值观正在一步步形成，大都敢于进取敢于牺牲敢于奉献，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一到中年，一些“经历”就容易固化，进而积重难返。